

冯天瑜
主编

中 华 文 化 书 系

史笔春秋

戴 扬 本



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

中华文化书系

冯天瑜 主 编

杨国章 副主编

史笔春秋

戴 扬 本

北京诚诚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史笔春秋/戴扬本著.

-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8

(中华文化书系/冯天瑜主编)

ISBN 7-5619-0660-9

I. 史…

II. ①戴…

III. 中国—古代史—史籍—研究

IV. K2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25473 号

责任印制: 乔学军

出版发行: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区学院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00083)

印 刷: 北京北林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版 次: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5.75

字 数: 106 千字 印数: 0001-3000

书 号: ISBN 7-5619-0660-9/G·9831

定 价: 9.00 元

序

在西方人眼里，中国位处遥远的东方，是最早迎接光明的处所。^①

这不仅是从地理方位而言，就人类历史发生的先后顺序来说，东方也较早沐浴文明的曙光。诚如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所指出的：

当黄河长江已经哺育出精美辉煌的古代文化时，泰晤士、莱茵河和密西西比河上的居民，还在黑暗的原始森林里徘徊。

至于中国人自己，截至十九世纪中叶以前，一直以为居于“天下之中”，而且拥有超乎外邦异族的优越文化。^②这种认识在今日看来当然未必足取，因为中国并非世界的中心，只不过占据着亚欧大陆东侧；古代世界也并非只有中国这一个文明中心，巴比伦、埃及、印度、希腊、波斯、阿拉伯、印第安都创造过灿烂的古文

① 古代腓尼基人把地中海以东的陆地称为 Asu，意即“东方日出处”，地中海以西陆地称为 Ehb，意即“西方日落处”。以后 Asu 变化为 Asia（音译“亚西亚”）；Ehb 变化为 Europe（音译“欧罗巴”）。这两名称被希腊人所沿用，并传播给欧洲诸民族，后来更为世界通用。

② 汉语“中华”一词，其“中”字意谓“四方之中”，“华”字意谓“文化繁荣”。“中华”意为文化繁荣的中央之地。

明。然而，中国人固然不是一脉单传的“天之骄子”，却曾长期走在先进的文明国度的行列——

中华初民早在一百多万年前已与猿类揖别，从事渔猎、采集经济，创造原始文明，六七千年前逐步进入定居农耕生活，大约五千年前发明原始文字（陶文），而形成比较成熟完备的文字系统（甲骨文）则有近四千年的历史。

中华文化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延续力强劲，是世界上罕见的在长达数千年间不曾中断过的文化系统。以学术而论，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近代新学，此伏彼起，相承不辍；以文学而论，由诗经、楚辞、诸子散文发其端，汉赋、魏晋诗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续其绪，高峰迭现，波澜壮阔；中国还是史学发达的国度，准确的历史纪年和系统的人文记述已连绵三千余年；中国在十四世纪以前的一千年间保持着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技水平，曾为人类贡献了指南针、造纸术、火药、活字印刷、瓷器等重大发明，其医学、药学和武术，直至今天仍然富于旺盛活力；中国还是一个重视教育的国度，早在一千多年前便确立了通过考试而不是依赖身份等级任命官员的文官制度。凡此种种，使中国成为一个风姿卓异的“文明文物之邦”。

中华文化曾取得多方面成就，并在长达十几个世纪间走在世界前列。然而，中华文化存在的局限性又障碍着她实现近代转型，自十六七世纪以来，随着欧洲近代

文化的崛起，中华文化的领先地位逐渐丧失；到十九世纪中叶，昔日“雄踞万邦”的中国因其落后而被动挨打。但中国人并没有沉沦，饱经沧桑的中华文化也没有丧失生机，而在百余年间中西文化碰撞交融中赢得“凤凰涅槃”式的新生。今天，当中国人再次把握住历史的主动权，开创现代文明的宏图伟业之际，正依凭着中华文化提供的坚实而深厚的前进基地。人们要想了解现代中国诸事万象的奥秘，要想展望未来中国将给人类谱写怎样的华章，都必须回顾古老而又常青的中华文化，体味她那“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

这套书系试图通过对中华文化若干侧面的具象展示和知识性描述，透现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审美情趣、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以反映其民族特质和历史进程，可供学习汉语及中华文化的外国朋友参阅，亦可作为具有中等及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中国人了解母文化的读本。

冯天瑜

1993年1月26日

书于武汉

浩茫渊海（前言）

七百年前，中原大地正经历着一场惨酷的剧变。蒙古铁骑，由北向南，长驱直入，以不可阻挡的气势，直逼南海崖山，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有着悠远的传统，无论在物质抑或精神文明的成就方面都堪称当时世界最为发达的南宋王朝，竟然崩溃在带有浓烈游牧部落色彩的蒙古军队铁蹄之下了。

当骄横不可一世的元朝丞相博罗以胜利者的身份对被俘的南宋丞相文天祥加以劝诱时，得到的却是后者甘愿以生命为故国殉节的回答。面对“古今兴废有常”的慨叹，博罗不禁好奇地发问：“自盘古到今，究竟有几帝几王？”文天祥感慨地回答说：“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文天祥以不暇一一道来的态度，表达自己对不谙中原悠远文化传统的异族入侵者的轻蔑，也不经意地道出了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关系。

今天，一部十七史早已增加为二十四史，算来共三千二百四十九卷，大约四千万字。它系统地记录了从传说的三皇五帝开始，到17世纪明王朝覆灭的四千年间，我们的祖先在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的历史，是前人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字里行间，它向我们展现着千百年来，曾经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演出过的一幕又一幕雄壮

威武的戏剧。

二十四史卷帙虽然浩繁，也只是先民撰述的史籍中的一小部分，这只能说是统治阶层对历史的记录和整理。如果对从《汉书·艺文志》至清代《四库全书》所著录的归为史部类的书籍进行一次统计，卷数大约在十万卷之上；如果按每卷一万字计算的话，在主要靠手传抄流传，而后才发明刻版印书的时代，史籍文字的总量多达十亿之多！这不由使人感到由衷的惊讶和赞叹。就像19世纪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经感叹的那样，“中国的历史作家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

千百年来，几乎每一代都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不管处在什么时代，不管个人命运如何，始终在孜孜不倦地探寻着过往社会的奥秘。这种探索精神，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的一个鲜明特点，融为我们古老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历史的理性认识，使人们很早就意识到史学的意义远非单纯的记忆和遐想，这使得史诗式的记诵，在我们的祖先那里并不多见。当论述兴亡陈迹的时候，引起人们深深思索的，既有鉴戒，更寄托着追求。“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与“文章憎命达”的说法相似，历史老人往往也垂青于那些遭遇非人逆境之人，当国家、民族陷入危机，甚或沦丧之际，痛定思痛，人们往往更能体悟到社会发展变化轨迹的真谛，由此诞生了许许多多垂训千古的伟大作品。

华夏民族无疑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重视历史的民族，

这更表现在文化观念的深层。绵延数千年的中国文化，既是一种历史的文化，也是具有这种特殊气质文化发展的历史。中国人的人生观念，不含有宗教的色彩，却并非局限于现实的实用价值。因为，在我们看来，个人的有限生命是可以而且应该融入到无限的历史长河之中，著名的诗句“留取丹心照汗青”，便是体现这种价值取向的很好的例证。因此，当我们翻检数千年来浩博的历史典籍时，其意义便不仅仅从史书中探究一个事实，而且是从中寻觅、汲取丰富的思想和文化营养。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对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化的源流及其深邃的内涵有一个更加生动和更加完整的理解。

目 录

浩茫渊海 (前言)	(1)
一、斑驳陆离：中国古代史学的童年	(1)
(一) 闪烁在甲骨与青铜器上的历史	(2)
(二) 寥若晨星的先秦史籍	(5)
二、穷天究命：司马迁的《史记》与班固的《汉书》	(25)
(一) 纪传体史书开山之作——《史记》	(26)
(二) 煌煌大汉的故事——《汉书》	(39)
三、风起云涌：蔚为大观的六朝史学	(50)
(一) 乱世多修史	(51)
(二) 陈寿与《三国志》	(56)
(三) 范曄与《后汉书》	(64)
(四) 流韵余响	(72)
四、绚烂多姿：唐代史学的繁荣	(81)
(一) 史馆与初唐八史	(82)
(二) 杰出的史学家刘知几	(91)
(三) 杜佑与《通典》	(98)

五、会通明变：两宋史学主流的三部通史	(105)
(一) 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107)
(二) 百科全书式的历史书	(113)
(三) 探究会通之道	(118)
六、流波余绪：元明史学概貌	(126)
(一) 元代修史的记录之笔	(127)
(二) 走向社会深层的明代史学	(142)
七、旧学新知：清代史学的丰硕之果	(150)
(一) 天崩地解时代的三位史学大师	(151)
(二) 皇家正史的殿军之作——《明史》	(158)
(三) 乾嘉史学考证的辉煌硕果	(162)

一、斑驳陆离：中国古代史学的童年

远在四千年前，华夏民族的先民，在黄河流域繁衍生息的时候，便开始了用文字的形式记录社会生活的历史。根据后人的传说，夏桀统治时期的太史终古，见夏桀荒淫无道，劝谏无效而投奔了商朝；商代末年，纣王的史摯，在看到纣王的穷奢极欲，暴虐荒淫，认定其不得善终的时候，便带上他保管的文书典籍，逃亡周族。

传说毕竟是传说，不过，其中也不乏可信的成份。从保存至今的甲骨文来看，早在商代，便有一些被称作太史、内史、史、作册的职官，担任这些职务的人，便以文字形式，按照一定的格式，将社会大事刻写在甲骨上并保存起来。

记载历史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文字的发明。从今天已经发掘出的十五万片甲骨文资料来看，除去重复文字，约有四千五百个字，目前已经能够识读的有一千五百多字。与甲骨文属同一体系，时间上略晚于甲骨文的商周青铜器铭文中，今天可以识读的约有一千八百多字，不可识读的约一千二百字。就文字的发展而言，已经具备了记载历史的条件。

已经出土的甲骨文献还告诉我们，商代已经具备较夏历更为成熟的历法。这种历法，不仅有十二个月的名

称，还有十三月的字样，表明商代的人们已经懂得关于闰月的知识。大量甲骨文献记载的内容，其基本格式之一，便是认真注明记录的年、月、日等时间。

既然具备了史官、文字、历法这三个最基本的要素，我们便有了充分的理由认为，这些商代的甲骨文献是保存到今天的最早的史籍。当然，严格地讲，这些记录史事的文献与后世系统记载史事的史书有很大的区别，但这毕竟是先民们记载社会生活的开始。它不仅在形式上影响着后世史书发展的体例，而且在思想上也孕育了后代某些史学观念的萌芽。商、周一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的历史，辉煌而丰富，相比起来，包括后人整理的《尚书》、《春秋》在内，关于这个时代的记载，今天能看到的文献典籍未免显得单薄而支离，但这些毕竟是我们借以了解上古历史的唯一的文字资料，虽然寥若晨星，却默默地在向人们诉说着昨夜星汉灿烂的辉煌。

（一）闪烁在甲骨与青铜器上的历史

汉字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甲骨文献中的“𠄎”。古文字学家的研究告诉我们，它的本义正如它的形状所示，象征着一个持着简册的手形。它的本义是指史官，而不是指史书。史官的主要职责，起初是以从事宗教活动为主的，也就是后世所谓“主天事之官”。上古社会，由于物质生产手段比较落后，狩猎、农业生产、出征作战等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些偶然的未知因素，先民们便产生了在整个世界之上，有一个超自然的意志主宰

万物的神及神的观念。因此，史官除了掌管祭祀之外，凡是狩猎、征战、卜问来年收成等等重大事件，事先皆由史官来预卜吉凶，把占卜的内容和结果用文字刻写在甲骨上。事后，还把应验的情况，也一一刻在甲骨上。

甲骨文献的内容，为我们了解商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地理以及人们的风俗等情况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远在西汉初年，有关商代社会的文字史料非常少见，以致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记述数百年殷商史，只写了三千字。此后二千年间，有关这段历史的资料主要是后人根据《诗经》、《尚书》的部分内容加以转述。因此，当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甲骨文献被人辨识确认为三千多年前商代的遗物后，其价值之珍贵，在史学界引起的震动，是可想而知的。

相比之下，西周甲骨文献出土的数量要少得多，比如1976年在陕西岐山古周原凤雏村出土的西周甲骨文近三百片，大部分是西周灭商前文王晚期到康王初年的作品。内容也是为田猎、征伐、农业收成、出行等活动进行筮卜的记录，如文王求佑于商人先帝太甲、周伯祭祀商人祖先文武帝乙和成汤、周人伐蜀征巢等，这是研究西周早期与商人及周围部族关系的重要史料。令人称奇的是，西周甲骨文献上契刻的文字小如芥子，笔画细若蚊足，工整秀丽，最小的字直径只一毫米，宛如微雕艺术品，风格上显示了与商代甲骨文的显著区别。

周代留给我们的有文字记载的史料，主要是用大篆体文字铸刻在青铜钟、鼎、彝、尊等器物上的铭文，又

称作金文或钟鼎文。铭文的内容，有的记言，有的记事，多半是与征伐、俘获、诰命、封赐臣仆和田土有关。从文字学的发展来说，铭文与甲骨文属于同一体系，但是，与甲骨文献问答式的卜辞相比，铭文的内容已经具备散文的文体，与后来战国时期人们整理的《尚书》、《诗经》等儒家早期经典的语言特点更为相似。有些铭文在记录一件事情的同时，严格地注明年、月时间，如《颂鼎》：“佳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邵宫。”这篇铭文的写法，包含了史料的三个基本要素，即时间、地点、人物。文字的开始，即记年月，这种体例格式，显而易见地直接影响了后世编年体史书的撰写。

青铜器在商周两代是非常珍贵的器具，特别是礼器，其意义远不止它的艺术性或使用价值，而是象征着统治权力的威严。贵族之家，只有举行大典或祭祀等极其隆重的典礼，才使用由青铜铸刻的礼器。所以，后世的史书上常常可以看到“桀有乱德，鼎迁于殷”、“商纣暴虐、鼎迁于周”的说法。西周以后，青铜器上的文字渐多，西周后期，甚至有多达数百字的铭文。贵族们凡有重要文件，或遇重大事件需要永久记载保存的，往往铸造青铜器物，将有关内容记录在上。今天对我们来说，这些研究商周历史的第一手文字史料，价值之珍贵，无与伦比。

引用铭文来印证史书所记内容的一个精彩例证，是二十几年前出土于陕西临潼零口镇的利簋。利簋的铭文

共四行三十二字，制作于周武王继位后第四年的二月。铭文字数虽不多，却是目前唯一记载武王伐纣史事的公文，其叙及武王伐商的甲子纪日，与《尚书·牧誓》篇、《史记·周本纪》的记载完全吻合。我们在引用上述史料来讲叙三千年前的重大历史事件，而且能够如此精确地把握其发生的日期时，不能不对先民们记录和保存文献典籍的手段感到骄傲和自豪。

甲骨卜辞和青铜器铭文为我们保存了三千多年前商、周社会的大量信息，史料价值之珍贵自不待言。当然，由于这些材料所记的内容比较零乱，时间上前后也不衔接，以史料的标准加以衡量，也还有许多未能令人满意的地方。但是，这些史料仍应该被看作我国史学的开端，这些文献的知名或未知名的撰述者便是最早的史家。从甲骨文献到青铜器铭文内容变化的轨迹来看，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的体例已显露出雏形，而铭文从内容到形式，意味着人们希望将重大的社会事件记录并永久保存下去。这种观念，便是后世史学“前事不忘，后世之师”的垂鉴精神，我们因此也完全应该把它看作我国古代史学的萌芽。

（二）寥若晨星的先秦史籍

记载远古史事的典籍，最早的一部是后来被儒家奉为经典的《尚书》。从形式上看，这只是一部“上古帝王之书”，它是古代帝王的公告、训词、誓词，诰命等等各类文献的集合，部分内容的语言风格与铸刻在青铜

器上的铭文很接近，然以史为鉴的观念对后世政治思想和史学的观念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按照古代“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的说法，虽然《尚书》还不具备史籍的基本体例，然而我们仍把它看作是处在萌芽形态的史书。

《尚书》原称《书》，直到汉代以后才被称为《尚书》。古汉语中“尚”通“上”，所以，书名的含义便是上古之书的意思。由于成书的年代距今遥远，流传过程中又几经劫难，因此，对于这部书的作者、内容，自古以来便是学者们纷争不休的话题。这部文件集的汇编，相传是由孔子从夏、商、周三代的文书档案中选择编定的，这种说法，到了宋代，便有人提出疑问。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尚书》中如《虞书》、《夏书》等篇，因为其中表达的一些概念，如天象、地理方面的叙述，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人才具有的知识，这样，由孔子编定的说法便更不可靠了。

公元前 213 年，秦始皇在建立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之后，文化上也采取了大一统的措施。非秦纪的史书，以及《诗经》、《书》和百家之说，绝大部分都被烧掉了。焚书使古代流传下来的典籍遭到严重的破坏，也为《尚书》的流传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当汉初统治者致力复兴文化事业时，曾经做过秦朝博士的经学大师伏胜公开了他暗中保存下来的《尚书》残本二十九篇，被称为“今文《尚书》”，并得到流传。过了五百年，东晋时豫章内史梅赜献出一部相传是西汉武帝时在孔子住宅宅